

古人谈文章写作

徐立陈
新编著



古人谈文章写作

徐立 陈新 编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25311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1025311

古人谈文章写作

徐立 陈新 编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97,000字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370册

书号10111·1425 定价1.75元

前 言

朱熹有两句诗是写得很好的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从源流上看，白话文的源头就是文言文，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承启关系。所以，古文的写作方法，对白话文的写作，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这种借鉴与反对八股可以并行不悖。我们知道，古代的白话小说，就因用过古文的写作方法。《水浒传》是白话小说，金圣叹认为“《水浒传》方法，都从《史记》中来，却有许多胜似《史记》处。若《史记》妙处，《水浒》已是件件有。”我国最早的西洋小说翻译家林纾，不仅认为文言、白话文法可以相同，而且中西文法亦可以相通。他说：“是书（指美作家斯士活的《黑奴吁天录》）开场、伏脉、接笋、结穴，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。可知中西文法，有不同而同者。”（《黑奴吁天录·例言》）。外国小说是否就有桐城派的“义法”，大可以研究。但古今中外文章的写作方法，有“不同而同”，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。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平素阅读古代文话、文章评点一类的著作时，注意摘抄古代作家的一点语录。诗文同理，因而也偶尔摘抄诗话中的语录作为补充，随阅随摘，同时也写出一点心得体会。这样，日积月累，得文三十六篇，勉强辑成一册，题为《古人谈文章写作》。

我国散文源远流长，研究散文写作的文话、文章评点一类的著作，也极为丰富。象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文赋》，应该是我
国研究文章写作的最早的专著。宋代的文话，如《文则》、
《文章精义》；文章评点如《古文关键》、《文章轨范》等，也是
专谈写作的。明清以来，这类著作更多。至于讨论文章写作
的书信和单篇著作，那就更多了。如果我们 有“倒海探珠，
倾昆取琰”的精神，是能够从中发掘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来
的。现在很多高等院校文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，
这是极有意义的，将来一定硕果累累。至于我们的这些
文章，算不得整理研究，只是偶尔在这文海里拾取一两颗珠
贝，凭一点粗浅认识，勉强点缀成文，水平是有限的。就是
这本不象样的东西，也吸收了当代很多名家的研究成果。如
果有可取之处，那主要是吸取了这些成果的缘故；如果有不
当错误之处，那是出于我们的杜撰。希望专家指正，读者批评。

徐 立 陈 新

于华南师范大学

1236/03

目 录

前 言	1
文章源流	1
文章变迁	8
文章的功用	18
壮游长才	27
读书有得	32
“文字频改功夫自出”	39
“学古当知古人之病”	46
谈摹仿	51
明辨体制	59
储材·选材·用材	68
以意为主	79
结 构	90
层次波澜	98
尺水兴波	106
开头结尾	112
开合·转接·伏应·跌宕	126
文章题目	138

死法活法与常法变法·····	142
“法以去弊，亦易生弊”·····	152
论 说·····	159
叙 事·····	170
宾与主·····	182
虚与实·····	190
泼墨与惜墨·····	208
形与神·····	217
细 节·····	227
状物写景·····	235
对话描写（一）·····	247
对话描写（二）·····	256
“唯陈言之务去”·····	261
比喻之于诗文·····	268
释《文则》十喻·····	277
夸 张·····	285
用 典·····	291
警策秀句·····	297
“四六”入散文·····	305

文 章 源 流

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①；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②；赋颂歌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③；铭诔箴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④；记传盟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⑤。

（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）

夫文章者，原出《五经》⑥：诏命策檄，生于《书》者也；序述论议，生于《易》者也；歌咏赋颂，生于《诗》者也；祭祀哀诔，生于《礼》者也；书奏箴铭，生于《春秋》者也。

（颜之推：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）

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。虽非为作文设，而千万代文章，从是出焉。

（李塉：《文章精义》）

孔子于《乾》《坤》之言，自名曰“文”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⑦。

（阮元：《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》）

至文王拘幽，始立文字，演《周易》。

（曾国藩：《圣哲画像记》）

盖古代文词，恒施祈祀，故巫祝^③之职，文辞特工……欲考文章流别者，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！

（刘师培：《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》）

连属文字，亦谓之文。而其兴盛，盖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记神事，更进，则史以记人事也，然尚以上告于天；翻今之《易》与《书》，间能得其仿佛。至于上古实状，则荒漠不可考。

（鲁迅：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

文章，即**彰彰**，本义是文采的意思。文章二字上所加之“彡”，古文表示光彩。“文”的本义是人形，不过不是一般的人形，而是加以彩绘、装饰的偶像。所以，“文”字有彩画装饰之意；“章”的本义是雕出文彩、花纹的玉器。所以，“章”字有光彩、彰明之意。从“文”“章”二字的本义来看，所谓文章，是比较重形式的，必得有文采。

文章一词与语言文字发生联系，大概始于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中有两处提到文章：

子曰：“大哉！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。焕乎！其有文章。”（《泰伯》篇）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公冶长》篇）

“焕乎！其有文章。”这是说尧的文章多么光辉呀！尧的什么“文章”呢？即“政之施布于天下者”，如礼乐法度之类。“夫子之文章”又是什么呢？即“得之见于外”的“威仪文辞”。

不管“礼乐法度”也好，“威仪文辞”也好，都是指见于外的语言文字的东西。《后汉书》说：“古者帝王有所号令，言必弘雅，辞必温丽，垂于后世，列于典经，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。”可见，《论语》中“文章”一词的用法，与后代是比较相近的。

战国末期和两汉，已经将语言文字通称为文章。如荀子《非十二子》：“圣王之文章具焉”；如司马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”；如班固《汉书》：“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……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。”班固《两都赋序》进一步指出：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雅颂之亚也。故孝成之世，论而录之，盖奏御者千有余篇，而后大汉之文章，炳焉与三代同风。”这里指出了当时文章的内容与作用：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”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，直到唐代，虽然出现了文笔之分，但文章一词，仍然使用得很宽泛，无韵之“笔”称文章，有韵之“文”也称文章。如曹丕《典论论文》称“文章经国之大业”；宋范曄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，“文学”与“文章”，名称混用；梁萧子显《南齐书》，特立文学传，而篇中则称文章不称文学。这期间讨论写作的专著，也多以文章名篇，如晋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，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，梁任昉的《文章缘起》。一直到唐代，文章与文学，仍然混用，如韩愈“李杜文章在”，将李白、杜甫的诗歌也称为文章。所以，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说：

盖其时文章界域，极可弛张，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

声；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，必有藻韵，盖移人情，始得称文。

文章界域可弛可张，古人对文章的定义也就多种多样。今举章炳麟的说法如下：

夫命其形质曰文，状其华美曰彩，指其起止曰章，
道其素绚曰彰，凡彩者必皆成文，凡成文者不皆彩。

（《国故论衡·文学总略》）

这段话需要一点解释。章太炎是把文章同彩彰分开的。所谓文章，“命其形质曰文，指其起止曰章”；所谓彩彰，“状其华美曰彩，道其素绚曰彰”。但是，他又说，“凡彩者必皆文，凡成文者不皆彩”。这意思是说，彩彰可以包括文章里面，但文章不能包括在彩彰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文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，举凡文学与非文学作品，都可以称为文章；但彩彰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，专指文学作品，所以不能包括文章。《文论要诠》说：“文彩义别，而文者大名，彩者小名，举大则可以该小，举小故无以包大也。”惟其是“大名”（广义概念），经、史、子、集、诗、辞、歌、赋，统称为文章；惟其是“小名”（狭义概念），必得俚辞韵语为彩彰。

文章的定义不一，文章的起源的说法更复杂。

文章与诗歌不同，诗歌是在未有文字之前，就有了口头文学，而文章的出现必得在有文字之后。什么时候有文章，那一家或那一篇是文章的鼻祖，综合我们所摘录的各家文字来看，大致有三种说法：

一、文章起源于《五经》说。刘勰、颜之推和李塋为其代表。刘勰和颜之推都认为《五经》是千古文章之祖，所谓“文

章者，原出《五经》”。他们并具体指出，象论说之类的文章，源出于《易经》；象君王的诏书，大臣的奏章之类，源出于《书经》；象诗赋之类的韵文，源出于《诗经》；象规戒之类的箴铭，源出于《礼经》。宋朝的李塗同他们的说法基本相同，不过他认为除了《五经》之外，《四书》（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也是千古文章之祖。在我们看来，《五经》《四书》，的确如李塗所说，“虽非为作文设，而千万代文章，皆从是出。”历代作家，都从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中吸取了有益的写作经验，这只要看韩愈、柳宗元读书写作的经验，就可以取得明证。韩愈自称读《易》得其“奇而法”，即变化之法；读《诗》，得其“正而葩”，即思想纯正，文字优美；读《春秋》，得其“谨严”，即不能增减一字^⑨。柳宗元自己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但是，正如清人田北湖在《文章源流》中所说：“太古之文出于民间，中古之文出于史官，春秋之文出于经学。”准此，源出于《五经》之说，只及流而尚未穷源，算不得探本溯源之论。

二、文章起源于圣哲说。阮元与曾国藩为其代表，但说法不一。清人阮元说起源于孔子的《文言》。《文言》一文，据称是用韵文、对偶写成的。阮元在这里不过是拾出孔子的《文言》为后代骈文张目而已。曾国藩则归功于周文王。文王立文字，演周易，未必有据，用传说作为证据，那显然是不够严肃的。此外，还有近代人黄侃有文章完备于圣哲之说。他在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中说，“盖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语，惟圣人为能尽文章之妙。”意思是说，文章是有思想有文字以后就有了，但体制必得完备于圣人。中国喜欢把创造发明归功于

圣哲，如文字本来是群众创造的，但硬要说成是仓颉所创造，还说“仓颉四目，是为并明”。仓颉有四只眼睛，看什么都比常人清楚，所以能见“鸟兽蹄迹之迹^⑩”，创造出象形文字来。古人认为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因此也必得推举一个圣哲来做创始人。实则，文章也如同文字一样，一个人是包办发明不了的。

三、文章起源于巫史之官说。刘师培、鲁迅力主此说。此种说法较为可信。文字为群众所创造，但整理、统一文字是巫史之官。因此，他们用以连属文字，是很自然的事。同时，巫史之官是“祭主赞词者”，古代记天事、神事、人事都是巫史之官，没有文字以前，大抵凭口耳传诵来完成这类工作，等有了文字之后，他们当然就用文字了。当然，出于巫祝之官之说，是指官府垄断了文字之后说的。正如文字一样，文章也一定最早萌芽于民间，最后为特权者所收揽，成为治人者的东西。田北湖断言“太古之文出于民间”，这虽然还需要证实，但他这话是颇有道理的。

【注释】

(1) 论、说、辞、序，是四种论理文体。刘勰认为这四种文体都是来源于《易经》。

(2) 诏、策、章、奏，是古代君臣上告下、下告上的论事的文体。刘勰认为这四种文体是《书经》发其源。

(3) 赋、颂、歌、赞，是古代四种抒情的韵文。《诗经》是韵的总汇，所以凡韵文都是从《诗经》来的。

(4) 铭、谏、箴、祝，也是韵文，但为古代举行一定仪式时所

用，故曰出于《礼》。铭，是勒功之文；诔，是累列死者德行之文；箴，是规讽之文；祝，是祝告之文。

(5) 纪、传、盟、檄：纪、传，是纪事之文；盟、檄，是论事之文，刘勰认为这四种文体都是以《春秋》为根，由《春秋》发展演变而成的。

(6) 《五经》：五部儒家经典，始称于汉武帝之时。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

(7) 孔子解释《乾》《坤》意蕴的文章，名为《文言》，用韵语和对偶写成。阮元是以孔子《文言》作为证据，认为一切文章都是用韵语、对偶写成的，以此为骈文张目。

(8) 巫、祝：巫，专司祈祷的官。我国古代，巫的权力很大，主要的职司是奉祀天帝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。祝，也是祭祀时司告鬼神的官。

(9) 韩愈《进学解》：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……”

(10) 仓颉：黄帝的史官，汉朝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中说：“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”。迒，háng，兽迹；书契，即文字。又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春秋演孔图》：“仓颉四目，是为并明。”

文章变迁

故知歌谣文理，与世推移，风动于上，而波震于下者也。

故知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，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。

（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）

一代之兴，即有一代之治；一代之治，即有一代之学；一代之学，即有一代之书。

（胡蕴玉：《中国文学史序》）

文虽小道，实与时代而变迁。

（刘师培：《论文杂记》）

二三千年来，中国的文章（主要是散文）有过几次大的变迁，每一次变迁都带来文章的空前繁荣。春秋战国是我国文章的第一次大变迁，是我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在“百家争鸣”和“处士横议”的局面下，产生了象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这一类优秀的历史散文；也产生了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这样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的诸子散文。如刘师培所说：“中国文学，至周末而臻极盛。庄、列之深远，苏、张之纵横，韩非之排骞^①，荀吕之平易，皆为后世文章之祖。”（《论文杂记》）。两汉虽重辞赋，而议论散文

和史传散文仍有其突出成就，象贾谊、晁错、王充这样的论文作家，象司马迁、班固这样优秀的史传散文作家，他们在散文的流派、风格以及语言艺术方面，有继承也有创新。唐宋古文运动，是我国文章又一次划时代的大变迁，是我国散文的第二个高峰，先后出现了唐宋八大家，他们对散文的文体、文风、技巧、语言，有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。可以说，我国的散文，经过唐宋已经逐渐从实用散文发展成为文学散文，其影响之深远，是无与伦比的。近代的白话文运动，也是我国文章划时代的又一次大变迁，比起历史上的几次大变迁，时间还不算长，但也产生了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这样优秀的散文作家。

如何看待这种变迁，文章繁荣的条件是什么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？刘勰认为文章的变化受时代学风的影响，不同文体的兴衰和时代有关，即所谓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。刘师培也认为“实与时代而迁变”。所谓与时代有关，即与那个时代的兴衰治乱有关。是兴治之时文章才繁荣呢，还是衰乱之时文章才繁荣呢？这就有了不同看法。一种是认为兴治出文章。清人胡蕴玉就是这种观点，所谓一代之兴，即有一代之治，即有一代之文章。所谓兴，所谓治，即看生产发展的规模，经济繁荣的程度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哲学、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。那个时代的经济与上层建筑相适应，文章就繁荣。大兴大治文章必定大繁荣，小兴小治文章也就小繁荣。

还有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意见，认为文章繁荣不是产生兴治之时，而是产生于衰乱之日。那个时代“玉纲解纽”、

“不尚一尊”，那个时代的文章就繁荣。这种意见的逻辑是：“王纲解纽”，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不是那么严厉，也谈不上“崇尚一尊”了，因而容易造成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局面，知识分子精神解放，思想活跃，无所顾忌，敢于写文章，所以文章自然就得到繁荣。他们认为我国文章的几次大的变迁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。春秋战国是如此，唐宋古文运动是如此，五四运动也是如此。

其实，兴衰治乱都与文章密切相关，“王纲解纽”能出文章，兴治之时也同样能出文章。

一般都认为春秋战国是“王纲解纽”、“不尚一尊”的时代。周末王室衰微，“礼乐崩坏”，这时“士”的阶级极为活跃，刘勰说这个时代是“六经泥蟠^②，百家飚骇”，六经被抛弃，而百家象狂飚卷起使人惊骇。“百家争鸣”，“处士横议”，因而促成了文章的繁荣。今天有些人是很羡慕这样的时代的，“春秋战国时期文章的发达，在两三千年 的历史范围内，简直是空前绝后的。”（郭预衡《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》）。春秋战国固然是“王纲解纽”，是奴隶主衰落、奴隶制崩溃，但另一方面，不又是新兴地主阶级崛起，封建制度确立之时吗？这个时期的“士”，除了庄子为奴隶主唱挽歌，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之外，其他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韩非子、纵横家无不 为新兴阶级、新兴制度而鼓吹，而辩论，而著书立说。这个时期因为是封建制度确立之时，加上战争频繁，因此地主阶级关心的是：如何确立新制度，如何结束战争、谋求统一，如何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。统治者重视“士”的作用，都想罗致门下，齐有“稷下”^③，楚有“兰台”^④，为统治